

从边缘到中心——试论杨绛作品的经典化历程

杨淑尧 周方正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翻译家——杨绛, 一直是近些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然大部分学者都将研究目光锁定在其小说、戏剧、翻译作品上, 对杨绛作品的经典化历程探索则相对不足。本文试图从出版传播、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三个方面, 梳理杨绛作品的经典化历程, 探讨其背后的建构性因素, 为杨绛及其作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 杨绛; 经典化; 出版传播; 文学批评; 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一直是近些年来文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没有经典, “‘当代文学经典’的提法, 本身就有违经典的定义。”经典是要盖棺才能定论, 需隔代经过岁月的洗涤, 这种看法未免太过片面。当代学者吴义勤指出: “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 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的确, 杨绛作品的经典化历程便是同其创作生活相伴而行的。斯蒂文·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中也讲道: “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 包括了文本、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 图书的销量, 图书馆使用等)。”可见, 出版传播、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对于经典建构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杨绛作品的经典化正可以作如是观。

一、出版传播与杨绛作品的经典化

作家作品在经典化的过程中, 出版刊物、出版商、出版公司和编辑译者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杨绛作品的经典化同样如此。

首先, 优质的出版刊物对于一个作家的经典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1911年杨绛出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受到良好的学术教育, 1928年杨绛考入东吴大学, 继而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研究生, 也就是在清华大学杨绛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清华大学研究院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喜好跨系选修课程, 于是杨绛选修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习作”课, 在修读期间, 杨绛向朱自清先生交上了自己的第一篇散文习作——《收脚印》, 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许。随后, 朱自清先生将这篇散文推荐给正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做编辑的沈从文先生, 1933年12月30日《收脚印》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9期上发表, 署了杨绛的本名“杨季康”。《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出现较早的报纸, 1902年6月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 影响力大, 号召力强, 1927年12月5日吴宓向《大公报》的负责人张季鸾致函自荐, 成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 而后朱自清、沈从文等新文学领军人物先后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团队, 《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倾向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 后来《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所取代, 《文艺副刊》实现了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 新文学的作家作品开始登上《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舞台, 俞平伯、周作人、废名、冰心、蹇先艾、戴望舒、冯至等作家相继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 使得《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读者数量约20万人。对于初次踏入创作道路的杨绛而言, 第一篇习作就能够在质量如此之高的刊物上发表, 算得上是一种幸运, 同时也为她的经典化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4年杨绛尝试创作短篇小说——《璐璐, 不用愁》, 同样发表在《大

公报· 文艺副刊》上，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之后创作的散文《阴》发表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此外，杨绛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她的第一篇译作《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发表在《新月》杂志上，她唯一一部悲剧作品《风絮》则发表在郑振铎与李健吾合编的文学月刊《文艺复兴》之上。从《大公报· 文艺副刊》到《文学杂志》再到《新月》杂志和《文艺复兴》，这些影响力极大的刊物使得杨绛在文坛逐渐站稳脚跟。

除了优质刊物的助力，出版商和出版公司也是杨绛作品经典化过程中的一大因素，下面以杨绛的散文《干校六记》为例，分析出版商和出版公司在作家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1981年杨绛创作了散文《干校六记》，记述了自己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里的改造经历，用平静的笔调反映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生活。文章写成后杨绛将手稿交给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托他转寄香港，范用看完书稿后舍不得交于香港那边，但慑于十年文化动乱的影响，又不敢在内地出版，无奈将稿子寄出，使《干校六记》得以在香港的《广角镜》杂志上发表，不久被胡乔木同志读到。在一次会议上胡乔木同钱锺书谈及《干校六记》，评论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罗银胜 2016: 239）并认为这么好的作品当在内地出版。杨绛得知胡乔木的意见之后，给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写信并转述胡乔木的话，意在减少出版社的政治包袱，同时请她转问范用同志是否可以在内地出版。范用知道后喜出望外，立即撰写了选题报告并附上胡乔木的评语作为政治保险杠，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曾彦接到报告后，签署了自己意见，认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得比较平淡，可以出版，但恐怕不会引起什么轰动。尽管如此，范用还是坚信自己的眼光，两个月后《干校六记》第一版在内地发行，首版两万册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读者的热烈欢迎，随后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俄文等被传至海外。2000年9月，《干校六记》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干校六记》的出版与三联书店和范用同志有着莫大联系，若不是范用同志从中斡旋，《干校六记》恐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干校六记》在国内的出版得力于三联书店和范用先生，在国外的传播则需出版商、编辑和译者的合力。《干校六记》问世后，非常畅销，“并于 1984、1985 和 1986 年相继出现了三个英译本。三位译者中一位是旅居美国多年的华人学者章楚，一位是专门从事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还有一位是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e)。”（章艳 2010: 26）三个译本中以葛浩文的译本最受欢迎，这与作者、编辑、译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有关，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许诗焱在美国访学期间，参观了坐落在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中国翻译档案馆，并有幸阅读了葛浩文与作者杨绛、编辑宋淇、高克毅之间的 83 封通讯信件，“这 83 封信件的时间跨度长达 4 年，内容涵盖翻译的各个方面，既有关于文字翻译的细节探讨，也有对于文本风格和文本风格之后的时代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思考。”（许诗焱 2016: 95）《干校六记》中文单行本非常单薄，总字数也只有 33000 余字，而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编辑之间的 83 封信件总字数是原文字数的好几倍，信中就标题以及术语、方言、诗句、双关等的翻译展开讨论，翻译工作之细致令人难以想象。比如，1982 年 12 月 27 日杨绛写给宋淇的信中，委婉地指出了英译本中的几个错误，希望再版时可以得到更正。信中写到：“p. 13 左，末行。‘an eastern kang’，原文看不出是多数少数。其实炕有七、八只，不只一只。p. 14 左，第六行。‘a pot of water’，原文‘一锅炉水’，i. e. 一个锅炉(boiler)的水，供全连喝用的……”（许诗焱 2016: 100）可见，在翻译过程中，各方都是字斟句酌，力求达到完美，《干校六记》的英译本翻译，可以说是凝聚着诸多人的心血。《干校六记》英译本作为 Renditions 丛书之一出版之后，宋淇收到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刘绍铭先生的来信，信中讲到《干校六记》背景复杂，美国学生因不了解《干校六记》背后的故事，普遍觉得该书难以理解。宋淇收到信后立即同葛浩文联系，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由葛浩文执笔，在《干校六记》的篇末加上 20 个详细的背景注释，由此，解决了国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因不熟悉历史文化背景而产生的阅读障碍。《干校六记》英译本就是在作者、编辑、译者共同的努力之下，逐渐完善起来，在海外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

二、文学批评与杨绛作品的经典化

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可以为批评家提供丰富的创作土壤，而卓越的批评家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两者相伴而生，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杨绛的文学道路始于散文创作，而真正让杨绛在文坛名声大噪的则是她的两部戏剧作品《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伴随着杨绛戏剧的发表、出版、演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人们以不同的阐释标准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在读者接受、批评家阅读、观看与批评所形成的多维力量推动下，杨绛作品的经典化地位开始逐渐确立起来。

一九四二年的一个冬天，陈麟瑞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在座。大家拿着长筷按照蒙古人的吃法从火舌里抢羊肉吃。使杨绛联想到《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于是陈麟瑞、李健吾二人就怂恿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罗银胜 2016: 106）杨绛当时并未将此话放在心上，但当生活闲暇之时不免技痒，于是她利用零碎的课余时间，创作了戏剧《称心如意》。后在陈麟瑞的建议之下，杨绛将《称心如意》改成一部四幕剧稿，立即开始排演，阵容强大，由黄佐临导演，林彬彬演李香玉，李健吾扮演徐朗斋，上演后大获成功，报刊各有评论。“戏剧家赵景深认为，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杨绛写得如此细腻周到，令人称赞。”（吴学昭 2017: 193）剧评家方中也评论道：“近一二年上海演出的话剧，差不多都是悲剧，悲剧似乎容易讨好观众，容易骗得观众的眼泪，而观众也觉得能落泪的就是好戏。于是悲剧便‘洋洋大观’了，成了利薮，终至产生了悲剧的悲剧，所以此时此地《称心如意》的创作与上演，值得称赞，不但因为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喜剧，并且是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吴学昭 2017: 193）这里赵景深和方中都肯定了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沦陷区的特殊背景为杨绛的戏剧提供了特殊的上演环境，大家整天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战争阴霾之下，连剧院也尽是赚人眼泪的悲剧故事，如此氛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称心如意》的上演，让人们在灰暗的生活中看到一丝生活的乐趣，也给百姓紧张忐忑的生活添了点笑料，所以上演之后，好评如潮。《称心如意》以后，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由上海同茂剧团搬上舞台，获得极大反响，演员们竞相以演出杨绛剧本为荣，杨绛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上海文坛的名人，李健吾针对这部戏剧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里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里程碑数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李健吾 1946: 3）将杨绛戏剧奉为现代文学中的第二道丰碑，且不论此评价是否中肯，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弄真成假》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时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孟度和麦耶的剧评。

1944年5月10日孟度在《杂志》月刊第15卷第2期上发表了文章《关于杨绛的话》，孟度认为在“目前如此动乱、淫靡、畸形发展的社会，要想产生大量真正艺术的剧作是不可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喜剧’、‘闹剧’，正是反映这种吸血的商业社会的镜子。这时候居然悄悄地出来一位杨绛先生，使关心戏剧艺术的人们在紧张刺激、纷乱杂沓之余突然宁静下来，同时体味到一种和谐美。”并称“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战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苏了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孟度说：“可惜，我无缘拜观她的第三部喜剧《游戏人间》，想来定有惊人之笔。我们真盼望她再接再厉，有新的创作出来，使我们在这苦窘的时期得到一点心的温暖！”（孟度 1944: 2）说到戏剧《游戏人间》还有一段小插曲，1944年《游戏人间》由上海苦干剧团在巴黎大剧院上演，但后来杨绛认为《游戏人间》是匆忙之作，自己并不太满意，于是将稿子毁掉了，这里孟度叹息自己

无缘一睹《游戏人间》的风貌原因也在此。孟度点明了当时上海的戏剧圈杂草丛生，戏剧质量不高，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戏剧少之又少，创作家只是一味地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忽视了艺术上的追求，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坛乱象之下，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一经演出，便获得评论家们的认可。同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活跃剧评家的麦耶（即董乐山），在观看过杨绛的几部戏剧之后，也写了两篇关于杨绛戏剧的文章《〈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和《〈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并评论道：“杨绛女士对于整个戏的看法恐怕是悲剧式的。比如末一幕的结局，应该在大璋与燕华互相不愿的情形下，被迫结婚，幕急落，这样才有喜剧的效果。可是作者却并不如此，她在众宾散后，还感慨地假周大璋之嘴阐明了她的人生哲学与处事艺术，一味要活在这世界上，即使境遇不好，也应该吹牛以满足，自我安慰，精神战胜物质的方法。我们撇开这种精神不谈，杨绛女士这样肯定他们的结合，又教他们干一杯祝贺新生活的开始，完全不是在写喜剧，而冲淡了前数幕的喜剧性了。”（麦耶 1944: 6）同之前评论所不同的是麦耶在这里并没有一味地称赞杨绛戏剧，而是看到了杨绛喜剧背后隐藏着的巨大悲哀，那是一种含泪的笑，而不是简单的闹剧。也正如麦耶所看到的一样，杨绛戏剧骨子里是凉的，在观众们大笑之后，留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凄然。1945 年杨绛如麦耶所料创作了悲剧《风絮》，并决定由上海苦干剧团搬上舞台，但因抗战胜利局势多变等原因，没有如期上演，这也是杨绛的最后一个剧本，抗战胜利后杨绛没有再进行过剧本创作。建国以后，柯灵写了《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称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存中的有数的好作品。‘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杨绛写的就是这种含泪的喜剧。因为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味。”（柯灵 1982: 6）柯灵的评论较精准地指出了杨绛戏剧的特点，《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的“喜剧双璧”称号由此而来，以后的评论者大多使用这一词语来形容杨绛的戏剧成就，在杨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评论家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文学史书写与杨绛作品的经典化

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评论家的参与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史书写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文学价值往往会被那些具有超前性眼光的文学史家所关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文坛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潮流，杨绛及其作品成为文学史家所关注的对象。

最早将杨绛写入中国文学史的大陆学者应该是唐弢，1984 年他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书，其关注点主要放在抗战时期杨绛在上海沦陷区所做的四部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风絮》上面，并给予杨绛戏剧如下评价：“作家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描写世态，鞭辟入里，而语言幽默，含着眼泪微笑，富有个人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当时是佳构，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唐弢 1984: 369）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早关于杨绛作品的评论，基本将杨绛戏剧定位为通俗戏剧，准确中肯，也是从这本文学史开始，杨绛的身影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逐渐清晰起来。199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这部文学史引用了柯灵在《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一文中提出的“喜剧双璧”一词，形容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两部戏剧是为文学界和市民观众所欢迎的作品。这本书用了将近一面的篇幅介绍了杨绛及其作品，文中先讲述了《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的大致内容，然后点评道：“剧作家一方面坚持美好、合理的人性标准，对小市民的弱点进行揶揄批判，另一面又不同于对客厅主人的‘伪雅’生活态度的针砭，对这些下层小人物‘改造环境’、‘改变命运’的努力与生存态度，不乏肯定与爱怜。这种‘感情超过理智’的喜剧，摆脱了简单的价值判断，弱化了启蒙意识，更多的是一种智慧的观照。”（钱理群 1998: 495）这里对杨绛的戏剧创作观进行了总结，指出杨绛的写作是一种知识书写，作者所披的隐身衣背

后藏着的是一颗仁爱之心，这也正是杨绛戏剧魅力之所在。在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之际，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8月又推出了由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下册，这本书中虽提及杨绛，但内容较为简短，只一句：“本时期有影响的剧作还有：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便草草结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对杨绛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她的戏剧创作方面，而散文方面则没有涉及，这主要是因为杨绛早期散文创作如《收脚印》、《阴》等零星发表在期刊上，没有形成较大轰动，而她的戏剧则是在上海著名大剧院上演，场场爆满，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并有许多评论家为之撰文，这就在无形中巩固了杨绛在文坛的地位。

杨绛的创作生涯长达七十多年，十年文化动乱过后，杨绛重新提笔写散文，用冲淡平和的笔调，记录了动乱年代的流离生活，真可谓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罗银胜 2016: 239）杨绛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进入当代文学史学家的视野。1999年9月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问世，这本书介绍杨绛作品用了接近五面纸的篇幅，十分详尽。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本书中先讲了杨绛的生平经历，又向读者介绍了杨绛的戏剧，还提及作者的文学文论集《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小说《洗澡》，以及译作《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等，接着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杨绛散文的魅力。一是“作者善于以小见大，寓深意于言外，耐人深醒。”（王庆生 2004: 450）二是“作者善于通过叙写凡人细事，传达人间真情真境，而且文字简练传神，每每涉笔成趣。”（王庆生 2004: 452）最后是“作者字里行间所透漏出来的作者和她的亲朋友们的美好情操和人格魅力。”（王庆生 2004: 453）杨绛散文在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占的位置无疑是极高的，但也不无道理，读杨绛散文仿佛是接受一场心灵的洗礼，使人如浴春风，更加纯粹。2003年6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田中阳主编李阳春副主编的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同样使用五面篇幅介绍杨绛，田中阳将杨绛散文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忆念亲人、友人的怀旧忆人之作，”（田中阳 2003: 341）另一类是“状写‘文革’这一荒诞时代的反思之作。”（田中阳 2003: 343）然后分析了杨绛散文在艺术表现上所呈现出的“随意、轻松、诙谐、去雕琢、远刻意，实为大巧不工”（田中阳 2003: 344）的特点。两年之后董健、丁帆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着重点评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指出《干校六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正常”出“反常”，“通过自己以及与自己命运相关的一群人的遭际反映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丁帆 2005: 493）这同前面文学史中提到的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意义相同，表现出杨绛散文与时代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此外，2008年张健编写的《新中国文学史》，2010年吴秀明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等都或多或少地提及杨绛，可见八十年代以后杨绛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绕不开的作家，不仅国内如此，国外的学者也对杨绛作品有着浓厚兴趣。

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一书，该书作者耿德华在第五章“反浪漫主义”中用了一节的内容来介绍杨绛及其戏剧，如果说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和钱锺书，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耿德华发现了杨绛，他的《被冷落的缪斯》早于大陆四年就已将杨绛写入文学史中，推动了内地学者对杨绛的发现和关注，他对杨绛作品的经典化起着根本性建构作用。2013年三联书店推出了《剑桥中国文学史》由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文中评论道：“除了通俗剧，‘风尚喜剧’也颇受欢迎。杨绛是此文类中的佼佼者。从东吴大学和清华大学毕业后，她和夫婿钱锺书赴英深造，就读于牛津大学。在友人的鼓励下，她写了《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剧本，以讽刺知识分子为主调。”

（孙康宜 2013: 641）这本书中的部分叙述是有待商榷的，比如杨绛在清华大学并没有毕业就随钱锺书出国留学，在牛津大学她只是旁听生，并没有正式就读。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国外有诸多读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杨绛学的发展，让杨绛及其作品走出国门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杨绛作品长达37年的经典建构中，不同的文学史观念和解读层面的介入，使杨绛的作品在文学史长河中逐渐由模糊至清晰，从单一到多样，充分体现出杨绛作品作为经典的特质——“具有多种言说可能的包容性。”

从上述论证中可见，在杨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出版传播、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当然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舞台演出、读者阅读、文学评奖机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近些年来“爱钱及杨”的现象使得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杨绛，但其著作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值得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柳士同. “经典化”得太匆匆[N]. 文学报, 2014.
- [2] 吴义勤. 当代文学“经典化”：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面向[N]. 光明日报, 2015.
- [3] [加] 斯蒂文·托托西.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 马瑞琦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4] 罗银胜. 杨绛传[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6.
- [5] 章艳. 从增译效果看翻译中的“阐释有度”原则——以《干校六记》英译本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10 (4) .
- [6] 许诗焱: 基于翻译过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J].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 (5) .
- [7] 吴学昭. 听杨绛谈往事[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7.
- [8] 孟度. 关于杨终的话[J]. 杂志月刊, 1944 (2) .
- [9] 麦耶. 七夕谈剧[J]. 杂志月刊, 1944 (6) .
- [10] 柯灵. 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 (2) .
- [11] 唐弢.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2]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3] 王庆生. 中国当代文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4] 田中阳主编, 李阳春副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5] 董健, 丁帆, 王彬彬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6] 孙康宜, 宇文所安主编. 剑桥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 [17] 杨绛. 杨绛全集 1, 小说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18] 杨绛. 杨绛全集 2, 散文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19] 杨绛. 杨绛全集 3, 散文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20] 杨绛. 杨绛全集 4, 散文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21] 杨绛. 杨绛全集 5, 戏剧·文论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er——On the Classical Process of Yang Jiang's Works

Yang Shuyao Zhou Fangz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 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dramatist, novelist and translato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Jiang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most scholars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eir novels, dramas and translation work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lassicization process of Yang Jiang's works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classicization process of Yang Jiang's works from the aspects of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ve factors behind it,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Yang Jiang and her works.

Keywords: Yang Jiang; classification;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history

作者简介: 杨淑尧, 湖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方正, 天主教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